

费德林 (Н.Федоренко) 等著

前苏联学者论 中国现代文学

宋绍香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1994 · 北京

目 次

前苏联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观.....	宋绍香 (1)
瞿秋白生平与创作.....	M . 施奈德 (14)
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鲁迅.....	B . 彼特罗夫 (32)
郭沫若简论.....	H . 费德林 (66)
茅盾论.....	H . 费德林 (77)
叶圣陶：冷静、严峻的现实主义.....	B . 索罗金 (95)
夏衍与中国电影艺术.....	C . 托罗普采夫 (108)
《丁玲选集》俄译本序言.....	Л . 波兹德涅耶娃 (116)
论巴金的创作道路.....	B . 彼特罗夫 (130)
论老舍的文艺美学观.....	З . 阿勃德拉赫马诺娃 (157)
论曹禺的创作.....	B . 彼特罗夫 (170)
作家学者钱钟书的《围城》.....	Л . 艾德林 (190)
艾青：创作与时代.....	H . 费德林 (200)
殷夫的政治抒情诗.....	H . 马特科夫 (219)

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俄译本序言..... H . 马特科夫 (242)

艾芜的早期创作 B . 索罗金 (247)

讽刺作家张天翼 H . 菲利普波娃 (256)

赵树理：创作与探索 H . 费德林 (262)

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春到山乡》 B . 克里夫佐夫 (283)

《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序言 B . 克里夫佐夫 (296)

评欧阳山的两部中篇小说 M . 切尔卡索娃 (304)

一场重要的社会变革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俄译本跋..... C . 伊凡科 (311)

马烽：中国农村新生活的探索 A . 贾托夫 (315)

前苏联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观

宋绍香

“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解体，然而，以高尔基和别林斯基为奠基者的苏联文学和苏联文艺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超越国度，超越时空，永远作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被保存下来，并将以一种巨大的文化潜能，继续影响于世界。

建立在苏联文艺理论基础上的苏联汉学——中国文学研究，必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载入中外文化史册，其研究成果，也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被承传下来。

—

前苏联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在俄国先辈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中俄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18世纪中国文学就传入俄国。当时，俄国著名学者Н·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1777—1853）的著作就已全面阐述了中国历史、人文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另外，他还翻译了许多中国著作。尽管Н·比丘林并非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然而，他的工作却为俄国其后的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专门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学艺术早期的俄文译品是从当时在俄国比较闻名的满语和欧洲语言转译过来的，虽然远不能完成这一翻译任务，然而，

运用这些语种也译介了大量的汉语著作。

继 Н . 比丘林之后，著名学者、汉学家巴拉季（ П а л л а ■ н й ）（ П . И . К а ф а р о в ,1817—1878）在俄国传播中国文化、文学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最大的成就是编著了俄国第一部《华俄辞典》（1888），为以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减少了障碍，从而使更多的俄国人认识了中国文学。

В . 瓦西里耶夫（ В . П . В а с и л ь в ）（1818—1900）院士是俄国汉学界志在把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介绍给俄国的第一人。他原是俄国东方学喀山学校的教师，曾在中国俄国教会工作10年之久，后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从教45年。В . 瓦西里耶夫是19世纪末俄国最大的汉学家之一。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他掌握汉语、蒙语、日语、朝语、藏语和满语，同时还了解梵语和某些突厥语系语言。В . 瓦西里耶夫的研究课题是中国文学（文字）史，主要专著有：《汉字的字体系统》（1867）、《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汉字分析》（1884）。其《中国文学史纲要》，系俄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书，目的在于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最伟大文学之林的位置，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尤其东方文化的发展中理应占据这一位置。

比丘林—巴拉季—瓦西里耶夫的汉学研究传统由下列一代俄国汉学家继承下来：С .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С . М . Г е о р г и е в с к и й ）、А . 伊凡诺夫斯基（ А . И . И в а н о в с к и й ）、П . 波波夫（ П . С . П о п о в ）、И . 扎哈罗夫（ И . И . З а х а р о в ）等。

俄国汉学家们的科学遗著为在苏联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前苏联汉学家们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苏联汉学的创始人是知识渊博、造诣深厚的学者、翻译家 В . 阿列克谢耶夫（ В . М . А л е к с е е в ）（1881—1951），他在50年的汉学研究中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提出要打破俄国读者对伟大的中国文学“还很陌生”的“这

种迷津”，指出“当前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就是使经过审慎选译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丰富起来”。他写道，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推倒“中国墙”。为此，他身先士卒，集中主要精力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诸如李白、陆机、司空图、文天祥、欧阳修等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他最感兴趣的是司空图的《诗品》和陆机的《文赋》，其译作不仅在苏联，就是在世界汉学界也堪称最优秀的典范译作。他还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对中国诗、书、画，对中国诗人同外国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写出了许多精湛的论著：《罗马人贺拉斯与中国人陆机论诗艺》、《法国人及其同代中国人论诗艺》。最后的两部力作是《中国画》与《中国文学》。

在В．阿列克谢耶夫的努力倡导下，一支比较庞大的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队伍在苏联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队伍不断壮大，分工逐渐明确，研究更加深入。仅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的前苏联汉学家就有：Н．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Л．艾德林（Л．З．Эйдлин）、В．切尔卡斯基（В．М．Черкасский）、В．索罗金（В．Ф．Сорокин）、В．彼特罗夫（В．В．Петров）、А．热洛霍夫采夫（А．Н．Желуховцев）、Л．明希科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В．谢马诺夫（В．И．Семанов）、Л．波兹德涅耶娃（Л．Д．Позднеева）、М．施奈德（М．Е．Шнейдер）、З．阿勃德拉赫马诺娃（З．Ю．Абдрахманова）、Н．马特科夫（Н．Ф．Матков）、В．克里夫佐夫（В．Н．Кривцов）、А．贾托夫（Агей Гатов）等。

Н．费德林系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东方学家、教授，专攻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费德林关于中国文学的著述甚丰，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是他的研究领域。仅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他就翻译、主编出版了多种作家作品文集和选集，如《鲁迅文集》、《郭沫若选集》和文集、《茅盾文集》、《中国20—30年代作品选集》等，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简论》、《中国文学》（含现代文学）、《中国文学遗产和当代生活》、《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等，以及大量中国

现代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论文。通过以上著译，费德林对中国现代文学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在苏联和国际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Л．艾德林主要翻译、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撰写了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在苏联汉学界占有显赫地位。同时，他也热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他翻译、主编了《鲁迅中短篇小说集》，并撰写了长篇序文《论鲁迅的情节散文》；主编了“外国作家丛书”《茅盾》，并撰写了长篇论文《茅盾》。他还为俄文版《围城》撰写了领头文章《作家学者钱钟书的〈围城〉》。

В．索罗金，是一位从50年代就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他先后翻译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围城》，还翻译了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艾芜、王统照等作家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其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1958年出版的大部头学术专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和1962年发表的学术专著《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年与艾德林合著《中国文学简论》，他负责撰写了《近几年的文学》一章。除此之外，在不同历史时期他还撰写了大量评论鲁迅、茅盾、叶圣陶、老舍、叶紫、艾芜及其他20世纪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天才的汉学研究家 В．彼特罗夫的科研范围主要是19—20世纪的中国文学。50年代初，他首先关注中国现当代诗歌，他与中国诗人艾青、柯仲平、李季、严阵、田间、袁水拍、肖三等都有直接接触和通讯联系。这便直接帮助了他的翻译和研究，很快便写出了较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当代中国诗歌》（1951）、《В．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现代诗歌》（1952）等。在此基础上他集中精力专门研究艾青，于1954年便完成了《艾青评传》。这是一本具有首创性的研究专著，当时不要说在苏联，就是在中国也是第一本。该著研究了艾青各个时期的创作，分析了他的文艺美学观、创作风格特点、自由体诗歌。著者特别注意艾青与时代的关系，特别注意其诗歌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基调。

彼特罗夫的研究范围在扩展，从现代诗歌转向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他对下列作家的研究兴趣最浓：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郁达夫、丁玲、曹禺。1954年他翻译出版了鲁迅的《野草》；50年代初着手翻译出版《郭沫若文集》，译出了《棠棣之花》（1953）、《虎符》（1955）等郭沫若的五个历史剧，1958年又翻译出版了《郭沫若文集》第2卷，1960年参与翻译出版了两卷集的《曹禺戏剧集》，并撰写了具有学术性价值的后记。彼特罗夫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更专注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写出了大量卓有见地和深度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诸如《鲁迅与中国诗歌》（1958）、《鲁迅生活与创作简论》（1960）、《鲁迅和郁达夫》（1967）、《鲁迅和瞿秋白》、《郁达夫的创作道路》等，都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力作。

Л. 切尔卡斯基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他最大的兴趣和成就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他涉猎了几百首中国现代诗歌后，一连推出了两部研究力作：《中国20—30年代的新诗》（1972）和《战争年代的中国诗歌》（1980）。作者以翔实的资料，首次运用世界文艺学理论分析了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式、风格、结构和文艺美学，对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六、七十年代活跃于苏联汉学界的还有一位М. 施奈德，他专注研究瞿秋白，1975年翻译出版了《瞿秋白选集》，并撰写了序言和注释。《瞿秋白（1899—1935）的创作道路》（1964）也出自他的手笔，该论著全面研究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中共领导者之一、作家、诗人、翻译家瞿秋白的遗著。1977年他又推出学术专著《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翻译、评价、创造性发展》，在苏联文艺理论研究中最早再现了中国传播俄罗斯文学的情景，探讨了中俄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文艺理论汉学家А. 热洛霍夫采夫50年代末60年代初专注研究中国中世纪文学，并且成果卓著。然而，1966年他在中国实习

时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动很大，于是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1968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文革”近距目击记》，1969—1979年写出专著《中国的文艺理论与政治斗争》，后来还为《中国的文化命运》撰写了专章。

热洛霍夫采夫继而翻译和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他关注鲁迅、郭沫若、巴金等著名中国现代作家的命运，并撰写了许多有关论文，诸如《“文革”后鲁迅著作在中国的命运》、《鲁迅在美国汉学界》、《郭沫若最后的历史剧》以及《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等。

总之，前苏联汉学界人才济济，成果累累，是中国文学（不只现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中不可多得、不可忽略、不可遗忘的一支学术队伍。经过前苏联汉学家们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动，可以说，中国现代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大都已移植到苏联，大都有专人（或学术团体）研究，而且成绩十分壮观。

二

前苏联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与俄国时代研究中国文学的根本不同在于，俄国时代研究者们观察中国文学问题主要是从当时统治中国精神生活的孔孟之道、儒教世界观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创作的语言文学艺术的立场出发去研究中国文学；而前苏联学者们更新了研究观念，一开始便从新的，真正科学的立场出发，在马列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将中国文学作品开始视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反映。基于这一点，前苏联汉学家们特别注意从宏观上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把握它产生的那个特定时代，强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探索作家的人生和创作道路，重视本国前辈作家和世界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并运用比较的方法阐明作家对于这些“影响”的发展、突破、创新和超越。在此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充分的艺术的分析：人物形象、艺术风格、语言特色

等等，对作家作品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著名汉学家彼特罗夫对鲁迅的总体概括可以代表前苏联学者对鲁迅的总体评价：“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真实地、多面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现实，以其伟大的作品开辟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新纪元。鲁迅优秀的文学遗产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及其憧憬光明未来的具体体现。”彼特罗夫认为鲁迅早期的学术研究和翻译活动对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学术研究使他接受了先辈作家的优秀传统，翻译西方作品使他找到了东欧和俄苏文学。所以，他指出：“鲁迅创造性地发展了以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的不朽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发展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创作经验和优秀的文学成就。”但是，他强调，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决不会破坏鲁迅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决不意味着鲁迅摒弃了自己的民族传统。鲁迅永远是一位深刻的富有民族性的作家。”

郭沫若的好朋友著名汉学家H·费德林，经过对郭沫若多年研究后这样概括道：作为社会活动家、作家的郭沫若的形成是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时期的开端，与与之相关联的革命斗争的新形式同步发生的，他的“20年代的诗歌创作是与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紧密相连的：作品充满了对于封建传统思想和反动统治的憎恨，愤怒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指出，郭沫若的异乎寻常的多才博学、完全创新的科研活动、积极主动的社会政治工作以及直接参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一切便决定了郭沫若作品的开阔、精深、博学”。

茅盾，以其半个多世纪的光辉的文学活动、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辟的文学理论和大量的文学翻译，早为苏联汉学界所倾慕。著名汉学家B·索罗金在其《纪念茅盾》一文中评论道：在中国历史处于重要转折关头的几十年中，茅盾描绘了异常广阔而又丰富

多采的生活图景，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与之相媲美。”无独有偶，H·费德林在自己的研究论文中也指出，“茅盾著作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也许，不能创作出如此广阔的现代中国社会的画卷，不能描绘出这么丰富多姿的同代人形象系列，不能象茅盾在其中、长篇小说中那样提出这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他分析茅盾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1932），认为“作品以独特巨大的艺术魅力”，“运用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所应有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指出茅盾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反映时代的重大社会现实，塑造各种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环境和思想。”

前苏联学者们对于叶圣陶的儿童文学特感兴趣，他们往往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叶圣陶儿童文学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年轻学者H·列别杰娃认为对叶圣陶早期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有两种评价：一种是以美国学者夏志清为代表的评价，认为叶圣陶的儿童题材作品代表了传统上对儿童心理和儿童福利的冷淡，以及社会对于现代教育的漠视……而另一种则是以前苏联评论家M·蒂尔洛夫为代表的评价，认为叶圣陶“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的主题之一，是人类的幸福，精神生活的充实。作家用他笔下的形象有力地表明，人是为幸福而生的；他还呼吁对青年一代要给予极大的关注。”列别杰娃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过我们认为苏联学者的看法更正确，更能给人以启发。”一些研究者很重视叶圣陶创作风格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雅·普实克认为叶圣陶文学，“一方面，是出自传统文学的土壤；另一方面，已经渗入了一种新的精神。”

M·施奈德评论雅·普实克上述文章时指出，普实克把叶圣陶创作技巧形成过程中的民族传统的影响放在首位是正确的，他说，“虽然中国文学可能也从欧洲文学中借鉴了不少东西……然而滋

育中国作家的主要源泉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丁玲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漫长的写作生涯，极其坎坷的人生经历，早为世界瞩目。前苏联学者对于丁玲的关注更是不言而喻；1952年苏联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1951年）。费德林指出，这一长篇的史诗性内容，固然与它题材的宏巨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丁玲既不简单化也不夸大地反映了包涵着全部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生活真实。也许作家的才能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多方面。这位语言艺术家所描写的暴风雨将临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译者Л．波兹德涅耶娃认为，“丁玲早期作品的特点是寻求，她还不能判断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未找到最典型的形象，阶级偏见的负担还重压着她”。但丁玲批判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致使“丁玲的每一部新作都是她在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方面向前迈出的新的一步”。这就使她创作出了最成熟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关于这部不朽的作品，这位女评论家结论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最早反映中国劳动人民生动的轰轰烈烈的创造性活动的作品之一，它标志着丁玲创作新阶段的开始。”

巴金的大名及其作品在苏联早已广为人知，他的作品发行了近50万册，В．彼特罗夫为他的俄译本《家》（1956）和两卷文集（1957）撰写了洋洋大观的序言，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

早在1937年，巴金的短篇小说就被译成俄文刊登在《在国外》杂志（第9期）上。1976年，莫斯科大学又出版了Л．尼科尔斯卡娅的学术专著《巴金作品概论》。该著作详细介绍了巴金的主要长篇及中、短篇小说，论述了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现实意义，为巴金30—60年代的作品勾画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著者指出，巴金20年代所受世界观方面和文学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因而片面地解释他的世界观问题是不妥当的。巴金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他的

作品里也有一些矛盾交织着、共存着。但是，“不管外国思想对他的影响多么强烈，巴金还是成了批判现实主义者——首先是他的同胞鲁迅——的文学和美学原则的坚定信徒。”著名学者A·热洛霍夫采夫声称“巴金是中国作家中最欧化的一个，外国文学，特别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他又批驳那种“说他（巴金）是个欧化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与民族土壤格格不入的作家”的说法。他说，“巴金是位既有声望又多产的作家，对促进中国革命进步的左倾气氛的形成是作出了贡献的。他吸引读者走上了倾向革命的道路，他的作品传播着革命情绪，是第一个台阶，走上这个台阶之后，距离中国共产党，距离有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便不远了。”看来，这种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客观的。

关于老舍，费德林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中以《老舍》为题设了专章（第13章），在其主编的《老舍短篇小说、剧本、论文集》中写了以《老舍》为题的领头文章，它们全面而深刻地分析、评论了老舍的艺术作品。彼特罗夫也为俄文版《骆驼祥子》写了题为《老舍及其创作》的篇头论文。A·季什科夫在为《老舍短篇小说》（俄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老舍的大名不仅中国知道而且世界闻名，他是许多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文和文艺评论的作者，是一位多产的老作家，是一位非常生活化的作家，一位讽刺作家”。他特别指出老舍的文艺评论著作是其“博学多才、富有敏锐鉴赏力和热爱祖国文学事业的有力证明”。关于这一点，著名学者3·阿勃德拉赫马诺娃则写了专论：《论老舍的文艺美学观》：详尽地、全面地、科学地论述了老舍的文艺美学观。论者指出，“研究老舍的文艺批评活动，不仅能深刻理解这位多才多艺的天才的全部意义，而且能拓宽我们的文艺批评观念，了解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们为反对导致‘文革’灾难的方针而进行的种种斗争方式和方法。”

曹禺的恢弘精湛的剧作博得了前苏联学者的浓厚兴趣和赞许。他们主要关注他的早期剧作《雷雨》、《日出》和解放后的话剧《明朗的天》。彼特罗夫在分析《雷雨》、《日出》等剧本后指出，“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人类思想解放的理想，这一切永远是曹禺剧作的思想基础。作家坚定地站在民主立场上向旧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评论家非常欣赏《明朗的天》，指出在评判生活问题和生活现象、鲜明的艺术特点与心理描写的深度，在塑造人物形象诸方面表现出来的高度思想性原则，“使话剧《明朗的天》跻入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之林”，“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人道主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使曹禺不仅享有全民族的，而且享有全世界的盛誉”。

继郭沫若之后，艾青的诗早以其激越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享誉海内外。著名汉学家B·彼特罗夫早在50年代初就推出了《艾青评传》，全面研究了艾青的早期创作，给艾青的诗歌创作以高度的艺术评价。另外著名汉学家H·费德林关于艾青也写了大量著述。在《艾青：创作与时代》长篇论文中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艾青的诗歌创作。他认为艾青是自由诗体的艺术大师，“在他的诗里充盈着清新的泥土色彩和气息”，他“能赋予作品以独具一格的美丽的画面和婀娜多姿的形态”。他指出“艾青的诗歌特点是以深刻的现实主义干预生活的现实性。”诗歌创作劳动是世界上最平和的，最受人尊敬的劳动之一，在这里艺术家（艾青）的犁“耕出了灵感的田地”，“播下了善良和真理的种子。”

前苏联汉学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卷帙浩繁，一篇薄文难以“概”全，只望从“漏万”之“挂一”中去窥见“一斑”吧！

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们，不但以瑰丽的文学精品而且以精湛的文学翻译博得了前苏联学者们的赞许。我们的文学大家们，真不愧“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他们大抵少年时代深受中国古学——古典诗歌、古典小说的影响，青年时代学习了外语，或出国留学（大多赴东洋），大都精通一两种外语，于是攻读外国名著、翻译外国作品，吸收了外国文学作品中许多有益的养分。对此，汉学研究家们非常关注，几乎每一位研究家在每一篇著述里都涉猎了这一问题，探讨中国现代作家们在翻译、传播世界文学特别俄苏文学方面的功绩，研究作家、作品所受西方尤其俄国文学的影响。B·彼特罗夫说，“鲁迅是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热情宣传者，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特别积极地翻译俄国和苏联作家的作品”。他列举了鲁迅翻译的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谢德林、法捷耶夫、A·雅各武莱夫等作家的作品。指出，“俄国古典文学及其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人道主义传统对鲁迅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郭沫若研究家费德林也指出“郭沫若作为世界作家和学者的优秀作品的传播者和译者成就卓著。他的译著甚丰。”并列举了他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歌德、莱默·伽亚谟等的著作。他还指出，郭沫若从青少年时代就拜读了泰戈尔、惠特曼、海涅、雪莱的诗歌，潜心研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尤其“惠特曼的歌颂人、歌颂人的劳动、歌颂愉快的生活感受和大自然的作品对郭沫若的早期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对瞿秋白、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夏衍、艾青、殷夫等诸多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也有类似的评述。

某些西方的汉学家们始终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大多留学于东洋（日本）和西洋（英、法）的中国现代作家们竟会喜欢俄国文学？起初，他们不得其解，仅仅认为是“心灵的相象”。譬如，1942年O·

布里耶尔就说过：“就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吸引力来说，俄国小说是无可匹敌的。俄国和中国小说家的心灵太相象了。”(21)直到1976年奥尔格·朗才承认，“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文学的兴趣是由他们对日益高涨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引起的”。(22)那么，俄国和苏联时期的汉学家们来琼为什么如此热情地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联想奥尔格·朗的供认，就不难回答了。

文学无国界。20世纪的文学，其主流，是开放的文学，革命的文学。

歌德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前苏联学者们的研究，在“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4.6于泰山脚下

注释：

H . T . 费德林：《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在苏联》。

B . B . 彼特罗夫：《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鲁迅》。

H . T . 费德林：《郭沫若简论》。

原载1981年4月8日苏联《文学报》。

H . T . 费德林：《茅盾论》。

H . A . 列别杰娃：《叶圣陶的儿童题材作品》，《东方文艺学问题 传统与现代》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雅·普实克：《叶圣陶和安东·契诃夫》。

M . E . 施奈德：《俄罗斯古典文学在中国》，莫斯科，1977，第11页。

H . T . 费德林：《中国文学》，1955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丁玲选集 俄译本序言》。

Л . А . 尼科尔斯卡娅：《巴金作品概论》，1967，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第一章。

A . H . 热洛霍夫采夫：《爱国作家巴金》。

B . B . 彼特罗夫：《论曹禺的创作》。

H . T . 费德林：《艾青：创作与时代》。

(21)(22) O . 布里耶尔：《巴金和他的著作》，第224、221页。

瞿秋白生平与创作

M . 施奈德

热烈的革命家、中共领导者之一、著名的政论家、文艺评论家、俄罗斯文学宣传者——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贫苦教师的家中。未来革命家的童年是艰难困苦的。家庭一年比一年贫穷，只好靠出卖父亲的藏书和家具艰难度日。最后，瞿秋白的父亲被迫卖掉了房子，家庭终于破产……

瞿秋白的才干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5岁就能背诵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的许多诗篇，爱好绘画，学会了石雕。他的母亲是一位博览群书富有文化教养的妇女，精通中国历史和文学，对年幼的瞿秋白给予了很好的影响。

瞿秋白7岁上私塾，后来就读于城市中学。尽管他是优等学生，但仍未能读完中学：他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

就是在中学里，瞿秋白最先接受了革命思想，这些思想的体现者便是该校的校长和某些老师——1911年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们。

1914年，瞿秋白离开故乡，来到江苏无锡当小学教师。在这里，巨大的痛苦给远离朋友和亲人的瞿秋白以沉重的打击：他的母亲对无端的贫困极端绝望，在常州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从此，瞿秋白的家庭彻底解体，于是，悲观失望情绪便笼罩了这个被个人痛苦和极端贫困弄得十分颓丧的青年。

1915年，瞿秋白住在武昌他堂兄瞿春白家里，瞿春白在精神